

明代朝鲜的求书

张 升

古代中国的文化优势是明显的，周邦邻国无不受汉文化的感染，而在这些邻国中，接受汉文化最深的无疑是朝鲜。朝鲜李朝（建国于1392年）时期，正相当于我国明清时期，而明朝建立于1368年，灭亡于1644年，两国相交二百多年，感情之深，我们可以从《朝鲜通史》中概括李朝、明朝、清朝三者关系的一段话中看出来：“朝鲜之于清，因其力不能敌，不得已而执属国之礼事之，实则不仅以清为仇讎而已，且以为胡虏而轻视之，无异前日也。盖朝鲜之于明，向以为中华文明之邦，甚尊敬之，且自壬辰救援以来，深感其恩谊，乃至今日竟不得不助清伐明，此最朝鲜所不能忍，而其时当路者之苦衷，亦实可怜也。”^①而明朝亦视朝鲜为知己：“今高丽去中国稍近，人知经史文物礼乐，略似中国，非他邦之比。”^②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，明以朝鲜为内服，李朝之于明，一直奉行其所谓的“事大主义”，并以此作为外交的方针大计，体现在书籍的交流上，即是李朝的求书与明廷的赐书。

一、求书的原因与范围

朝鲜向中国求书，源远流长，史不绝书。从总的来看，朝鲜在文化上落后于中国，受汉文化影响较深，有着深刻、传统的“慕华”、“事大”倾向，将中国看作为一个模仿、学习的榜样，因而其对汉籍的渴求是必然的，甚至达到了无书不求的地

步。具体就李朝时期而言，我以为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，探讨其求书的内在根源，指明其求书的大致范围。

李朝君臣普遍认为，书籍（包括求书、藏书、印书等）与治道有着深刻而必然的联系，在这一点上，他们的态度与中国君臣的看法甚为一致。他们认为：“书籍之藏，其来尚矣，有志致治者，莫不以斯为重。盖圣贤之立言垂教，历代之治乱兴亡，俱在斯。”^③又云：“书籍，治道所寓，历代攸重。”^④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，因而李朝的求书范围，多与治道有关，如：“欲令赴京使臣买书籍之切于观者，磨勘以启。乃以东岩周礼、仪礼、经传通解、续仪礼集传、集注、通志、中庸辑略、资治通鉴总类、通鉴本末、宋史、朱文公集、宋朝名臣五百家播芳大全、文粹、续文章正宗、备举文言、宋朝名臣奏议等书以闻。命付今去使臣之行，贸易以来。”^⑤所谓“切于观者”，是指最需要看的书，从其所列《周礼》等书名可看出，其中多为有关治道之书籍，因而，李朝所求最主要为此类书。

李朝国王，都喜爱读书，儒雅好文，其立国模仿宋朝，以性理为根本，学宗程朱，因而对儒家经典、宋明理学著作十分注意搜求，如《二程全书》、《朱子语类》、《伊洛渊源》等。其对《宋史》的搜求，尤为重视，曾多次向明廷求请。李朝工曹判书金安国在奏文中云：“臣到北京，自念圣上留心性理之学，大夫士亦知向方，思得廉洛诸儒全书及他格言至论，以资讲习。而留帝都未久，未得广求博搜，只以所得上进。”其所得计有朱子《语孟或问》、《家礼仪节》、《传道粹言》、《张子语录》、《经学理窟》、《延平问答》、《胡子知言》等，“皆要切于圣学者”。^⑥从这也可看出李朝注重搜集有关世道人心、化育万民方面的儒家著作。此外，李朝也仿效明朝实行科举取士，以五经四书为考试内容，因此与之有关的书籍自然也十分需要。

无论是明朝使臣还是李朝使臣，绝大多数为文人、学者，他

们在交往中，崇尚风雅，互相酬唱，赋诗作文，切磋学问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诗赋外交（朝鲜人还曾将这种应酬之作编成《皇华集》）。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，李朝使者比较注意搜求中国历代大家的诗集、文集，以之作为创作模仿的范本。而事实上，这些使臣在访明期间，随意搜集的也大多是这些诗文著作。

此外，李朝在行政制度、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学习明朝，因而注意搜集一些专业著作，需要这些方面规范化的专业知识，如音韵、医药、仪礼、法律、天文历法、军事等。据《李朝实录》所载：“天文、地理、命科，虽非重事，然天文则似为最紧。三学设立之意，岂偶然哉！且三学所业之书，非我国所创为也，出自中原，其来久矣。近来所业不精，甚为不可。中原岂无精撰新书乎？三学官员或差从事官，或差打角夫，令赴京使臣每年一人，次次带行，则庶可贸三学之书矣。”^⑦让一些专业人员跟随使臣到明朝求书，从这也不难看出其求书之苦心。正是在李朝使臣的苦心搜求下，朝鲜收集了大量各个专业方面的书籍，即便是军事、地图这些禁书，也通过民间途径获得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李朝十分注意搜求明朝新近刊印之书籍。李朝十分关注明朝最新的文化动态，其作出的反应是相当快的。我认为其这种做法，除了“慕华”心理之外，还在于其注重观察最新的政局，吸收最新的文化成果（如前面提到的“三学之书”）有关，因而也是相当明智的。从下面的几条史料中，我们不难体会其这种关注之情，如：“太宗皇帝撰五经四书大全等书久矣，本国初不得闻，逮庚子岁受赐，乃知朝廷所撰书史，类此者应多，但未到本国耳。须详问以来，可买则买。”^⑧“曩者传云已撰《永乐大传》（案：即《永乐大典》），简帙甚多，未即刊行，今已刊行与否，及书中所该，亦并细问。”^⑨“朝廷新撰诸史诸书若何？……《大传》刊在何处？……字样以铜个个铸之，随书排字而印出乎？……《大传》外又无新撰诸书乎？”^⑩

“中朝必有所撰书行世者，请令正朝使行次书状官买来，弘文艺文两馆书籍帙未具者，亦令收买，何如？”^⑪

从以上的分析可看出，李朝对明朝求书的意向是多方面的，求书的原因很复杂，求书的范围很广，可以说到了无书不求的地步。在很多情况下，李朝君臣认为，“国家最贵者书册”，“我国书籍稀贵”，因而外交方面最大而实在的收获就在于获得汉籍。而一旦这种价值观受到挑战时，他们本身就会觉得十分地难以接受：“购求遗书，不远上国，使臣之行，年再往返，而帑须物货，严科督纳，至于书籍，视为余事，求之不勤，此岂非贵物货而贱书籍耶？”^⑫“买我国所无书籍，近年停废，甚未便。”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，李朝对汉籍的搜求才能做到发自诚心与不惜重价，甚至不厌其烦地对需要的书一请再请，多方求购，如《宋史》、《大明会典》。而朝鲜人的这种做法，在当时中国人的书中，也有具体而生动的记述：“朝鲜人最好书，凡使臣入贡，限五十人，或旧典，或新书，或稗官小说，在彼所缺者，日出市中，各写书目，逢人遍问，不惜重值购回，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也。”^⑬这种勤奋的态度，真让国内有些藏书家自叹弗如，而异书藏本流于异域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二、求书

在无书不求的大前提之下，李朝使者在中国各显其能，开展了广泛的求书活动，包括两方面：其一是向明廷求书。李朝对明的朝贡，每年定期为三次（明末减为一年一贡），即圣节、正朝、岁币，后又增加一次，即冬至。此外，每年还有不定期朝贡，如谢恩、进表等。对于这些大多出身文人、学者的使臣来说，求书，无论是对李朝还是自己，都是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。其二为使臣通过民间购求书籍。由于使者向明廷求书并不都很顺利，朝廷有种种借口不赐予对方，如未刊印、没有藏本、有忌讳等，因

此使者只好通过贸易搜求。而事实上，大多李朝求得之书，并非来自明廷，而是来自民间。李朝使者朝贡，一开始是由海路来的，由于海路风险大，李朝请求经由陆路，而明朝怕其探知国内虚实，未予同意。后来迁都北京，两国关系日趋友善，也就同意李朝使者由陆路进贡，因而为朝鲜使者在相当长的陆路辗转中求书提供了方便。除了在路上购书，使者在京师逗留期间，也是购书的大好时机。我们从《李朝实录》中可以发现，使者在京之时，常逛书肆购得自己所需之书。

使者求书的工作，一般都是有备而来的，而这种准备，往往是李朝君臣上下当作非常重大的事情来看待。通常的情况下，由大臣商议，经国王核准，开出一个书单，交由使者求购，如《李朝实录》载：“中朝可贸书册抄考书启，故臣以藏书阁东西文武楼书册凭考。历代书册，则我国所无者甚多，故历代书册多抄启，然不能一时尽贸，每行次价物量给，随所见贸来为当。于礼部移咨请贸，则当以经学、理书为主，故多抄实学也。诸子百家不能尽抄，故只抄名家。且杂书、医药、卜筮、天文、地理亦不可不抄，故名录若是其多也。”^⑭大臣在此处详细向国王申明求书单开出的道理，并申求国王裁定。从这也可看出，这种准备是多方面的，除了对明朝的出版状况有大致地了解外，还要对本国的藏书情况有较全面的掌握，如李朝大臣认为本国所藏《地理大全》非全本，要求再求于中国。^⑮这样细致的观察，也关涉求书的工作。当然，决定需要什么样的书，还要分清主次，最需要的就急求，不断地求，如每年的《大统历》。又如：“抄其急要可贸书册，别定解文译官一人，须得善本以来，藏诸秘阁。”^⑯可见还重视对善本的搜求。除了开求书单，还要讨论具体的行动指导：“其从事官賫去事目：一、太宗皇帝撰五经四书大全等书久矣，本国初不得闻，逮庚子岁受赐，乃知朝廷所撰书史类此者应多，但未到本国耳。须详问以来，可买则买。一、理学则五经

四书、性理大全无余蕴矣；史学则后人所撰，考之赅博，故必过前人。如有本国所无，有益学者，则买之。纲目、书法、国语，亦可买来。凡买书必买两件，以备脱落。……”^{①⑦} 这里也详细说明了求书注意的事情，包括范围与件数。

既然将求书作为外交上重要的一项任务，也就不能不考虑这种工作与外交政策的关系，也就是说如何处理好求书与明朝政策的关系，尽可能地不触犯明廷的禁忌。在这方面，李朝官方表现出相当谨慎的态度，在求书的策略与技巧方面下了很大功夫，如：“（地图）在官之物，亦或禁之，而使不得见也，幸闾阎如有此图，则可以贸来矣。图乃一纸幅所印之物，其价必不甚重，今姑下谕圣节使之行，可贸则贸来，不可，则待后行贸之，何如？传曰：天下地图，中原闾阎间岂无有之者乎？今若不送布价而私自贸来，则或托以不贸矣。即令该曹价布磨练，为书状给马下谕，此虽禁物，多般广求贸来事，并下谕可也。”^{①⑧} 这里讨论的是对作为禁物的地图，是私自由民间购买还是通过官方许可而购求的问题，表明了李朝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所持的谨慎态度。通过下面所列的几条史料，我们或者更能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：“天文、历法、兵法等书，乃中朝所禁，礼部若闻求贸册名，则不当。”^{①⑨} “近来译官等求购书册，例称难得，持价而还，必因中朝禁令，不得随意贸来也。书册求贸，实是美事，而中朝待我国视同内服，若呈文礼部以示求购之切，则必不阻当。”^{②⑩} “书册乃重宝，若呈文礼部，则难得之册似可得贸。但上国九庙灾，则此是莫大之变，朝廷忧惧，至罪己颁诏中外，今则恐非其时。”^{②⑪} “中原有声息，今于圣节使之行，请勿贸书册。”^{②⑫} 可见其求书之谨慎与思虑之周到。

在阅读李朝求书的史料中，我们还可以发见，李朝君臣在求书中有着一一种共识，就是诚心与不惜价。这一点，在他们讨论求书问题上，被不断地加以强调。诚心，主要是就向朝廷求书而言

的，使者将自己置于乞求上国的卑下地位，锲而不舍地请求明廷赏赐。这样做容易博得明廷的好感，甚至能让明朝将一些禁书赏赐给自己，象前面提到的《宋史》、《大明会典》都是在诚心之下求得的。我认为，不管求书的结果如何，起码这种形式，是维系明朝与李朝关系的不可缺少的一环。不惜价是就购书而言的，在民间求贸书籍，使者可以根据需要比较随意地买进只要认为有用的书，而这些花销可以在回国之后在外交费用上开支。有了这种保障，所以使者都能放心大胆地选购，而我们在史料中也就很难发现有因价钱问题而废书不买的情况。另外，还需要说明的是使者的求书，除了在花销上没后顾之忧外，回去后还常常会因购得之书而获得丰厚的奖赏。这一点，在《李朝实录》中也多有提及。

“诚心购求，不惜兼价，则遗经逸书，庶几有得。”^②正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之下，二百多年来，使者广泛而勤奋的求书风气，才得以形成。

三、明廷的赐书

书籍是文化的载体，是文明的表征。向朝贡国家回赐书籍十足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文化优势心理。在这种心理影响下，皇明对所有外邦的求书，都基本上是欢迎的，并尽可能地予以满足。对于李朝，两国关系友善，山水相连，而李朝的诚心与“事大”、“慕华”倾向，更使得明廷对李朝的赐书更为广泛而普遍。

向李朝赏赐最多的书为《大统历》。《大统历》为明代奉行的历书，最能体现明朝的宗主地位，因而对《大统历》的奉行与否，意味着对明朝的臣服与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明朝对《大统历》的颁赐十分重视，明朝使臣到外国，通常赐《大统历》给外国国王；外国使臣来朝，明廷亦回赐《大统历》。《大统历》都是无偿颁赐的，并且是每年一次，一般都在年底（11月、12月）

赐下一年的《大统历》，数量为一百本。据《明实录》所载，受历最多，持续时间最长的为李朝。终明一朝，几乎每年都记载有向李朝赐《大统历》的情况，主要的原因因为李朝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且陆路近便，文化接近。此外，李朝确实也遵奉《大统历》，以为己用，如：“考各年唐历（指《大统历》），于乡历可添可削之条，悉录于后。其各年唐历之有者，乡历即添注之；唐历所无者，乡历并削去。”^②李朝每年冬至派冬至使（即受历使）到明朝来领取《大统历》，倘有特殊情况，未能领到，明廷甚至派使者送过去，如：“癸未，使臣舍人魏亨来赐日历，前此每年历日授本国节日使以送。今节日使南智回还时，朝廷未及颁赐，故礼部奉圣旨使亨追授南智，若不赶到，须直到王国交付。亨未及路上，故来也。”^③可见明廷对颁赐《大统历》的重视。

除了《大统历》，明廷赏赐得比较多的还有儒家经典、资政、伦理教育方面的图书，如《通鉴》、《通鉴纲目》、《孝经》、四书五经、《性理大全》、《劝善》、《内训》、《列女传》、《为善阴鹭书》等。明廷乐意赐予这些书，主要是出于对李朝倾慕中华文明的考虑。《明实录》中对此有比较明确的记载：“永乐元年，请冕服、书籍，上嘉其能慕中国礼文，悉从之，赐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。”^④“宣德元年，赐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及《性理大全》、《通鉴纲目》，上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：圣人之道与前代得失俱在此书，在天下国家者不可不读。闻李裒勤学，朕故赐之。若使小国之民得蒙其惠，亦朕心所乐也。”^⑤“宣德八年，赐《五经四书大全》诸书，……遣书赐王以为教子弟之资。”^⑥其实上面所列的这些书，基本上也是明朝国内士人的必读书，明朝乐意赐这些书，将这些国人的教科书普及到外域去，大概也有出于化育万民、抚近来远的天朝心理。

除了接受明廷赐书之外，访明使者还接受明朝官员的赠书，

而这方面所得之数，想来也是相当大的。与朝廷的赐书相比，民间的赠书要随意得多，许多李朝要求的书都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，如《李朝实录》载：“乙亥，圣节使质正官李昌臣来启曰：臣赴京之时，命市苏文忠公集，臣求诸北京，未得，乃还到辽东，偶遇进士前知县邵奎，与之语，因求苏集。奎即迎入藏书阁以示，仍赠之。臣欲偿之，奎却之曰：何用价为？所以赠之者，以为他日不忘之资耳。仍赠诗并序。”^{②⑩}这是一段中朝文化交流的佳话。辽东在当时是李朝使臣必经之地，因而成了向李朝输出汉籍的重要基地。此外，使朝的明朝官员，向李朝的赠书，也应加以注意，如“壬辰之难，故相臣李德馨从李提督如松平壤之战，观浙兵之布阵用技攻城鏖战之状，因询其教训习之方，遂得是书（指戚继光的《纪效新书》），以献于朝。”^{③①}这样随意就将兵法之书相赠，可见关系之友善。又如：同为“壬辰之难”的时候，东援明将一次送给朝鲜人李时发数千卷汉籍。^{③②}一次赠书就如此之多，实在难以置信，同时也令人深思。

四、求书的影响

李朝使者的求书活动，不但使者间的赋诗作文、互相酬唱、切磋学问，促进了相互的文化交流，而且李朝利用所获得的汉籍，滋养了自身的文化建设，无论是在音韵的吸收、法律的实施，还是历法的改进、小说的创作等方面，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，从汉籍中获得的积极影响是明显的。

使者们积极的求书，增加了李朝的藏书量，也推动了朝鲜图书刊印事业的发展。使者从中国搜求书籍回去后，一般经由国王御览裁定，将重要的书籍即时刊印，以广布为用。李朝盛时，校书馆“盖无一日无印役之时，每于赴京使行之还，如得中朝书籍之稀罕于国中者，即必随即印出，以为广布，故公私书籍，至不可胜读。”^{③③}围绕着求书与整理所得汉籍，朝鲜学者展开了深入

的目录、校勘、刻印、版本等方面研究工作，推动了其图书文献事业的发展。经过不断的求书，其国藏书之多，我们可以从1445年完成的《医方类聚》（金礼蒙著，365卷）一书中的引书可窥其一斑，此书所引汉籍一百五十三种（包括唐、宋、元、明初的图书），对原文不加修订，而系统地按疾病门类进行类聚。其中有四十多种现已失传的医书。由于李朝藏书之多，甚至连明朝也向其搜寻汉籍，如《李朝实录》载：“今付中朝寻访书目，归报尔（指琉球国使者）殿下，所有书册，送之可也。以天下而失其本，况海外之国，未之有也。然幸有一、二本，须宜送。”^③此段史料说明，明朝曾交付给李朝一个索书单，而朝鲜又转给琉球，让琉球帮忙求找。从这可以看出，李朝虽然没有按单给明朝送书，可是其拥有汉籍的影响是相当大的，否则明朝也不会向其索书。

从明朝中国流入朝鲜的汉籍，往往又经由朝鲜的印行，流布到别的国家，朝鲜可以说是汉文化传播的一个中继站。如《李朝实录》载：“日本国使臣求书册，只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何如？传曰：医方所以活人也，今客人所索多，而只许此书，无乃不可乎？如得效方东坡杜诗黄山谷诗学大成等许之，无乃可乎？”^④又如：“金国汗来书曰：闻贵国有金元所译书诗春秋等经及四书，敬求一览，惟冀慨然。”朝鲜国王的答书曰：“见索诗书等书籍，此意甚善，深嘉贵国尊信圣贤慕悦礼义之盛意。至国中所有只是天下通行印本，而金元所译，则曾未得见，兹未能奉副，无任愧歉。”^⑤崇祯二年，金汗又求于朝鲜，“金汗求书册，以春秋周易礼经通鉴史略等书赐之。”^⑥向朝鲜求书的国家主要为日本、金国、琉球，而以日本次数最多。据统计，从公元1388年到1499年的一百一十一年间，日本向朝鲜派遣的“请经使”多达83次，朝鲜输出日本的《大藏经》竟达四十三部，如按每部六千卷算，总卷数可达二十五万多卷。从这我们也可看出李朝拥有汉籍

之多，影响之大，印刷业之飞速发展。

最后，还想谈谈由求书而引出的两国外交的一番波折，或者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两国的关系有所助益。明正德年间，李朝使者从所得《大明会典》中发现有对其宗系诬陷之语，于是请求明政府加以更正。为了这一请求，前后持续了二百年，遣使十数次之多，每次都提出这一问题，直到万历十六年才正式在重修的《会典》中予以更正。获得这一消息，历代厚诬，一朝而雪，朝鲜君臣之喜悦，难以用言语来形容。哪知没过多少年，在万历四十二年，李朝使臣发现在野史的记载中仍有这样的诬陷之语，“臣等蒙差来到京师，仍留该馆等候圣旨间，适因循例讨买书籍，得见《吾学编》、《弇山别集》、《经世实用编》、《续文献通考》等四种书内，有纪载小邦事迹一款，委与《皇朝会典》所录，乖错殊甚，而又以不近情理之论，横诬先王。”^{③⑦}因而又是一番严正抗议。对于这一由求书而引发的争议，在《李朝实录》中记载得非常详细，君臣声泪俱下，痛陈冤曲。而《明实录》对此记载得很简略，明朝君臣对李朝的抗议反应是冷淡的，对其请求也屡屡借口加以拒绝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李朝也是万般无奈，这正如《朝鲜通史》上所说的：“此亦属国关系上不得已者也。”^{③⑧}

注：

①③⑧分别引自《朝鲜通史》，林泰辅著，陈清泉译，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，第191页，第140页。

②⑤⑥⑦⑧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分别引自《明实录类纂·涉外史料卷》第84页，第112页，第132页，第144页。

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分别引自《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》，吴晗辑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873页，第875页，第469页，第908页，第1258页，第388页，第388页，第389～390页，第874页，第1299页，第562页，第1296页，第388页，第1247页，第1300页，第1296页，第884页，第874页，第623页，第390页，第706页，第538页，第2908页。

⑪⑫⑬⑭⑮⑯⑰⑱均引自《李朝实录》，转引自《中韩民族与文化》“求书”，李光涛著，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民国五十七年出版。

⑲明·陈继儒《太平清话》。

⑳转引自《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》，朴真奭著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146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

《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》补正

《文献》1996年第一期发表程章灿《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》尚有失考及漏略，兹为补正如下。

（1）注□所阙四百余卷 原按：稹，不见于两《唐书》，此书书名待考。补正：稹为裴光庭之子，《新唐书》卷一〇八有附传近百言。所脱一字当为“记”字，盖指任起居郎时预撰起居注也。常袞撰《常无名墓志》云：“拜起居舍人，搜遗求实，典册大备，撰《开元注记》三十卷”，可作旁证。武德先天之际，起居注失修，故“玄宗留心起居注，选当时名儒执笔”（《松窗杂录》）补撰，成数百卷，当已在《新唐书艺文志》所著录之《开元起居注》内。

（2）《杨松年集》 原按：其名已泐不可辨，弘农人，茂卿子。补正：《新唐书·李甘传》有河南人杨牢字松年，父茂卿，附记孝行甚详。《唐语林·凤慧》作华阴人，有诗集六十卷。《唐登科记考》载其登大中二年进士第。可知所泐一字为“牢”字。存诗二首，残句若干。

（3）《李湍文集》 程文失收。《唐代墓志汇编》长庆008：“（祖）湍乾元初以经明行修春官上第，授瀛州乐寿县丞，有文集数卷行于代。”

（4）李昼《金门小集》二十卷 程文失收，见《唐代墓志汇编》大中112。略谓：昼，李程之孙，年廿九，登上第，大中八年擢授万年尉，直弘文馆，寻卒。“雅尚词章，常所著文成廿卷，自目为《金门小集》。”

· 张固也 ·